



时光泡酒

■ 文/葛小霞

母亲是极相信药酒的，家里的药酒也没怎么断过。

母亲的第一坛药酒是黑蚂蚁酒，那是父亲带母亲去南京看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医生开的。

那年我应该上初一，我哥上初三。父亲临行前，叮嘱我们在家要乖，不要调皮。我们在家真的很“乖”。我哥很安分，一直没出门。

但是他喊来了一帮“好朋友”，把家里的咸鱼、咸肉、香肠等，凡是带荤腥的菜，全部烧了炖了招待朋友了。我呢，虽然反对他这么做，但我从来不反对美味。父亲他们从南京回来，得知家里的食物被扫荡，还笑得眼睛眯成月牙。

母亲回来说：“南京人烧个饭，都是一小盘一小盘的，每个盘里都那么少。”父亲回来说：“带你妈去中山陵玩。一路上逗她。老赵老赵，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，看你怎么回去。”

带回来的黑蚂蚁酒，我把眼睛贴在坛身上看过里面，下面沉淀有一食指高那么多的黑蚂蚁，上面的酒呈琥珀色。母亲喝得很节省，每天小半杯。后来母亲身上的疼痛奇迹般的好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知是药酒的作用，还是南京之行的幸福泡在酒中的原因。

毕竟那是父亲生前带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，也是惟一一次。

后来，我们去福建云水谣的路上，在一个民宿买过两坛野黄蜂酒，一坛给母亲，一坛给婆婆。

野生大黄蜂泡酒不易得，对我们而言。

先生到山区喜欢走山路，白天还好，虽然山路十八弯，毕竟我们世业洲的居民都经过润扬大桥引桥训练过了，连续打弯都不在话下。

可是天色渐黑，拐了好多弯，还不见人家，我们有些着急。夜幕全部笼罩，山路上没有路灯，弯又急，这时车灯前闪亮出一条红色横幅，上面赫然写着一行白色大字“坚决铲除黑恶势力”。我们有点害怕，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跳出来个“要铲除的势力”。

冬瓜皮

■ 文/阮祥军

早晨去菜市场买菜，看到一个菜农码放的冬瓜，心头一热，买了两斤，回去烧个冬瓜排骨汤，当然，还有别的用途的。

切冬瓜的时候，我把冬瓜皮一片一片小心切了下来，孩子好奇地问我：“爸爸，这些冬瓜皮有啥用啊？”我说留着炒着吃。“冬瓜皮也能吃？”孩子睁大了眼睛，“能吃！”我摸摸孩子的头。

吃炒冬瓜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能吃饱饭都是奢望，更谈不上什么菜不菜的了。没有菜的时候，叫“扛菜皮”。“扛菜皮”严重的时候，只能吃白饭，有时候咽不下去白饭，就拿来一只小碗，在里面倒一些酱油，撒一些盐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蘸酱油汤吃饭，蘸一点酱油汤，下一口饭。

人在没菜吃的时候，会想着一些法子，找一些东西吃，炒冬瓜皮，就是拿来下饭的一道菜。

我家里姊妹多，小时候，家里经常“扛菜皮”，没有菜吃，大姐和二姐就做“酱油汤”给我们弟弟妹妹们下饭蘸着吃，酱油汤吃腻了，姊妹们死活不肯吃了。没有办法，姐姐们就想办法了，弄点

心吊在嗓子眼，拐弯、拐弯，再拐弯，终于有人家了，而且还是个红色革命村落。第一眼看到民宿招牌，啥也别说，就住这家。

打电话过去，老板来接我们。原本已经把心放回肚子里了，谁知还有更险的。这间民宿在山坡上，车子要开过只有一车宽的水泥桥，能听见桥下的水流汨汨落下山涧的声音。

老板说：“没事，方向盘把稳了，直的开。”

终于住下了。第二天，先生在民宿楼下一眼就看上了这两坛野黄蜂酒。

野黄蜂要比我们这儿的黄蜂大两三倍，估计药用价值也不小。带回来后，母亲和婆婆一直没有喝，不知是不是不敢喝。不喝也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外用嘛。

前几年回老家，客厅柜子上放着一坛紫红色的泡酒，母亲告诉我，是桑葚酒。

“你想喝喝吗？我接一小杯给你，很好喝的，对人身身体很好的。”母亲絮絮叨叨的。

她拿了一个小塑料杯，忙不迭地拧开酒坛下部侧面的开关。

“你觉得好喝的话，就给你装一瓶，带回去慢慢喝。你嫂子听人家说，桑葚酒好。正好有人知道哪里的桑葚好，她就跟人家摘了好多回来。这酒是你嫂子泡的。”母亲的话说不完。

我抿了一小口，味道确实很好。

这两天我们在给薏米酒重新装瓶，这酒是先生从贵州山区买回来的，瓷坛子的外面上了一层霉，地上也有，墙上也有。

装瓶的时候，奶奶伸过来一只透明罐子，里面装着一小段一小段的葡萄枝，她让我们倒点酒在罐子里，她要泡成药酒搽腿疼的地方。

酒从瓷坛子里舀起，一下一下倒入罐子里，润过葡萄枝，漫过葡萄枝，淹没葡萄枝。

酒里泡着往日时光，身边的世界却已慢慢老去。

讨债

■ 文/徐庭国

我年轻时，曾有过十余年乡镇法律服务所工作的经历，参与过上百起经济诉讼，也数十次受地方政府或企业、当事人委托，参与企业“讨债”，个中滋味体会较深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企业遇到的最大瓶颈，不是技术、市场、劳动力、人才等等，是资金，特别是“三角债”，资金回笼的快慢，往往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。

一次去郑州中医院催收安瓿瓶货款，三个人在陇海路上一个小旅馆住了二十几天。最后一天去少林寺，身上只剩两块钱，几乎弹尽粮绝，连拍一张黑白观光照纪念的钱都不够，幸好同事老徐成全了我。

某日夜晚，我和一厂长在西安大唐街观赏夜景，兴致正浓时，厂长的后背被人顶住，三个人围着厂长，一人压低嗓音对厂长说：“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老大大要见你。”我们这厂长是渔民出身，生得五大三粗，浑身炭黑，对方误将厂长当成“瘾君子”了，故有此一劫。吓得我们人行道不敢走，往大马路中间走，以引起警察的注意！

还有一次，我受标准件厂委托，去芜湖催债款，对方以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求退货。我在大马路上联系了一辆货车，连夜将十几万的货物装回镇，没钱可以，货在就行，十几万可以救活一个厂子。如果没钱又没货，那可亏大了。

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受领导指派，陪同压延厂厂长、供销员等4人前往西安、石家庄催收货款。

首站西安。第二天傍晚时分，去往玉祥门建材市场，在市场内找到了债务人，是个女同志，叫李师，50来岁，胖胖的，见人一脸笑，嗓门儿很大，给人精明能干，干净利落的感觉。一见面，她就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，自顾自地，像是说给我们听，又像是提醒自己：“还欠镇江五万货款，要不，你们明天早上来拿吧？”

我们表示同意后，她说：“你们住哪儿？”我告诉她我们的住址，她接着说：“噢，蛮远的，要不住玉祥门来，我来安排。”我们婉拒了她的好意：“还等收到钱结账呢，李师，您先凑两千元给我们吧。”我也是试探着说，没想到李师真爽快，立马给了我们两千元。

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，我们到了李师的公司，当得知我们还未吃早饭时，立马让人买来了油条、包子等，我客气了两句，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同来的厂长说不饿，拒吃，指责我们一脸的穷相，把镇江人的脸丢到西安来了。

早饭毕，谈正事，李师说欠镇江五万，昨天给了两千，今天付四万八千，两沓。我说：“李师，两千就别扣了，你答应帮我们找宾馆的，还答应陪我们到兵马俑游玩呢，我看啊，您忙，也别陪我们了，钱也别扣了，就付五万，你有空去镇江，我们陪您游金山，登北固山。”李师哈哈大笑：“冲您小兄弟这话，听您的，你们远道而来，两千块算我请客，就付五万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讨债路上，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好事，我也是头一回，那时，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也就百十来元，所以记忆犹新。

第四天，我们辗转石家庄拖拉机厂，办好事情后，供销员神秘地说：“你们知道我钱放什么地方吗？”我说不晓得。那个年代，没有这个卡那个卡的，也没微信、支付宝，百元大钞还没发行，一般都10元、20元的纸币，供销员习惯用蛇皮口袋装钱，随身携带，人到哪儿钱到哪儿，既不方便更不安全。只见供销员关上门，把席梦思翻转过来，指着席梦思背面床板上的一包红色塑料袋说：“我把钱用塑料袋包起来，钉在席梦思床板反面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小偷拿我也没法。”说着，撬开钢钉，取下钱袋。我说：“还没到家呢，火车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”四人相视，会心而笑。



下饭的菜。

冬瓜比较便宜，就买了一个冬瓜回来红烧，大姐和二姐把冬瓜切开，掏出内瓤，冬瓜皮一片一片切下来，没有舍得扔掉，摘点红辣椒，炒了一盘子辣椒冬瓜皮，也许是好久没有吃到菜了，那盘炒冬瓜皮，吃起来生硬味涩，可就是那么地下饭，每个孩子，都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。

不仅吃冬瓜皮，人家扔掉的西瓜皮，也被我们捡回来，洗净后，把红色的残瓢去除，青色的西瓜皮留下，找几个辣椒炒个菜。炒冬瓜皮，炒西瓜皮，填满了我们童年记忆。别人家的孩子，有吃鱼吃肉的满足，我们也有吃冬瓜皮的快乐，这份快乐，一直都藏在记忆的深处。

岁月悠悠，吃冬瓜皮早已成为了文章里的故事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吃鱼吃肉，也是每天餐桌上的日常了。而我，却时不时地，买点冬瓜，炒点冬瓜皮吃吃。生活好了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过去的苦日子啊。